

马茂元 选注
赵昌平

唐诗三百首选编

岳 麓 书 社

唐诗三百首新编

马茂元 赵昌平 选注

岳麓书社

唐诗三百首新编

马茂元 选注
赵昌平

责任编辑：熊治祁 王德亚

岳麓书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1985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350,000 印张：15.5 印数：1—200,000

统一书号：10285·37 定价：2.25元

前 言

在数以百计的唐诗选本中，清人蘅塘退士孙洙的《唐诗三百首》是流传最广的一种。二百多年来，它对唐诗的普及起了重要的作用，有其存在的价值。然而“存在”具有二重性，它是合理的，又是不合理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其不合理的一面就会逐渐显露出来。于是编选新的唐诗普及读本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今天的唐诗研究者身上。多年来，已有不少同志作出了努力。我们这部《唐诗三百首新编》就是在吸取各种新旧选本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所作的一次新尝试。

(一)

一部诗选是由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组成的，即选本的目的、对象与选家的文学观点。选家总是根据自己的文学观点，把一定的读者对象引导到自己认为是正确的道路上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二百年来，孙编《三百首》经历了由合理而转化为不合理的过程。

《三百首》原序云：

世俗儿童就学，即授《千家诗》，取其易于成诵，故流传不废。但其诗随手掇拾，工拙莫辨，且止五七律绝二体，而唐宋人又杂出其间，殊乖体制。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每体得数十首，共三百余首，录成一

编，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度，较《千家诗》不远胜耶？谚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请以是编验之。

可见《三百首》编选的目的是指示学诗门径。因为学慎始习，故入门须正。因为对象是儿童和一般读者，故首先注意到“易于成诵”，即可接受性。

可接受性是一切普及读本必须遵守的普遍原则。《三百首》吸取了《千家诗》的经验，做得尤其成功，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思想内容为学童与一般读者所易于理解。凡历史背景过于复杂，涉及的典章故实过于广博，或文理艰深，用意过于隐晦的，不选。

二是艺术形象能为学童与一般读者所欣赏，所领会。凡怪怪奇奇，或质木无文，缺乏审美价值者不选。

三是声调方面，专取音节和谐，富于韵律感，读起来琅琅上口者。凡诘屈聱牙，不便吟诵，难于记忆者不选。

《三百首》有不少成功的经验值得重视，例如书中选了杜甫不少长篇，却不选《洗兵马》、《自京赴奉先咏怀》、《北征》，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们不易为一般读者所接受。近年来有人据此批评孙编《三百首》排斥同情人民的作品，实为隔靴搔痒。果真如此，为什么书中又选有《兵车行》、《丽人行》呢？又如元结的五古，选《贼退示官吏》，而不取《春陵行》，诸如此类，都是费了一番心思的。

入门须正的原则，有其主观性和时代性。主观性指的是选家的文学观点，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论述，这里先谈谈有关《三百首》的时代性的问题。《三百首》成书于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当时的学童和一般读者，都将是科举应试的士子，

都可能步入仕途，因此所谓“正”，首先是思想纯正，凡离经叛道，或过于怨怼愤激，不轨于中庸者不录。其次，与思想紧密相联系的是技法之“正”。为了给试帖诗指明途辙，为应酬唱和揭禁规范，那就要求符合于雅正的诗风，不违背儒家正统的审美标准，凡旁蹊曲径者不取。这样，《三百首》就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时代的阶级的局限。

(二)

《三百首》在今天逐渐显现的不合理性，更在于孙洙的文艺观点，表现在他对“正”的艺术性含义的理解上。这即使在当时看来，也是比较狭窄的。

旧说一般认为《三百首》是以沈德潜的《唐诗别裁》为蓝本。今按：《三百首》所选五古四十首，见于《别裁》者三十四首；七古四十二首，见于《别裁》者亦为三十四首；五律八十首，见于《别裁》者五十九首；七律五十四首，见于《别裁》者四十四首；五绝三十七首，见于《别裁》者二十九首；七绝五十八首，见于《别裁》者三十五首，总计《三百首》收诗三百一十一首，见于别裁者二百四十四首，为百分之七十。这一数字，确实说明《三百首》与《别裁》有着一定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取资于《别裁》。然而是不是可以据此而说，《三百首》完全附庸于《别裁》，是它的复选本呢？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别裁》收诗一千九百二十八首，门庭广大，“备一代之诗”（《别裁》序）。孙洙所选“尤脍炙人口者”，自难完全跳出其范围，因此必须同中求异，看孙洙是本着什么观点来对待《别裁》，进行取舍的。倘若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除沈德潜外，对他产生更大影响的是王士禛。沈德潜

的格调说及其《别裁》，在崇尚唐音这一主要倾向上虽和渔洋笙磬同音，并无二致，但《别裁》之选，则又有意纠正渔洋专尚神韵而流于空疏枯寂之偏，《别裁》重订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在孙洙编选《三百首》前一年。孙洙兼取王、沈二家，而以王为主。他往往以渔洋观点，而且是渔洋晚年比较狭隘的观点对《别裁》进行修正。关于这，从《三百首》选目的框架结构即可看出。例如五、七言古体诗，《别裁》通选四唐，兼容各种不同的风格和流派，而《三百首》则集中在盛唐一段，于初唐略而不取，中唐入选者韦、柳、韩、白等寥寥数家而已。而且在五言这个领域里，韩、白亦不得阑入。于七言，晚唐仅取李商隐《韩碑》一篇作为殿军。所有这些，和《别裁》取径之广，大有径庭，而在渔洋的《古诗选》里，却能找到它的来龙去脉。孙编《三百首》大抵是以归愚所倡“温柔敦厚”诗教论与渔洋的神韵说相糅合，作为其选诗的指导思想。故所选诗篇，不但参考《别裁》，而且更多取自渔洋编选的几个唐诗选本。试将《三百首》选目与渔洋的《古诗选》、《唐贤三昧集》、《唐人万首绝句选》相对照，问题就不难看清楚。《三百首》内五古四十首，见于渔洋所选者为二十五首，较之见于《别裁》者少九首，这是因为《古诗选》不录杜，《三昧集》不录李、杜，而《三百首》选李、杜五古十一篇，实际上取诸渔洋者较《别裁》为多；七古四十二首，见于渔洋所选者为三十二首，与《别裁》同；五绝三十七首，见于渔洋所选者为三十一首，多于《别裁》二首；七绝五十八首，见于渔洋所选者为五十首，多于《别裁》十五首。以上四体，《三百首》共收诗一百七十三首，见于渔洋各选本者达一百三十八首，为百分之八十，较见于《别裁》者比例为高。至于五、七言律二体，因渔洋在《三昧集》中专选盛唐，而《别裁》通选四唐，故无法比较。然

而《三百首》所选盛唐五、七言律，几乎全部见于《三昧集》。合王、沈四选本观之，《三百首》所录三百十一首诗中，见于上举四选本者为二百七十首，其余四十一首，大部分见于高棅《唐诗品汇》、唐汝询《唐诗解》中。根据上述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孙编《三百首》是以王、沈二家之书为主干，参以其它唐诗选本而编成的。它的出现，与清初诗坛唐宋之争紧密关联着，是时代的产物。

唐诗宋诗不仅仅是朝代的区分，而是指诗风的殊异：“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参钱钟书《谈艺录》）。诗人崇尚不同，于是形成互相排斥的壁垒。这种论争，起自宋代，至明清愈演愈烈。孙洙生于康熙末年，卒于乾隆中期（一七一——一七七八）。当时王士禛、沈德潜先后主盟诗坛，风气所趋，使唐诗处于极负盛誉的阶段。但几乎在同时，袁枚的性灵说已经崛起，翁方纲的肌理说也已萌生，唐宋论争的情况是复杂而剧烈的。这一时代背景，决定了作为府学教授，担任引导生徒应试，博取功名的孙洙，必然以王、沈诸选为其所选之主干，决定了《三百首》成为唐诗派的一个普及选本。孙洙在序中极诋《千家诗》，其根本原因是因为那是一部带有浓厚宋诗色彩的选本，这从它大量收录杜甫开宋调法门的疏宕一路的七律，收录程、朱理学意味及欧阳修、苏东坡、杨万里的诗篇中可以看出。孙洙之诋毁《千家诗》，其矛头似正对着当时在江南逐渐风行的袁枚性灵派。

王、沈势力笼罩有清诗坛一百余年，时间最久，影响极深。这就是《三百首》在当时能够取代《千家诗》而广泛流传的原因。它的存在，在当时是充分合理的。

(三)

王士禛与沈德潜，作为唐诗派的主坛坫者，都受到明七子的影响。渔洋的神韵说固有怨于七子的肤廓空疏与竟陵派的尖新僻仄，然而过分追求“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特别是到了晚年，从中年时以唐为主，兼取唐宋的立场上倒退回来，专尚王、孟，遂流于枯寂空疏，与明七子貌异神合，故吴乔称之为“清秀李于鳞”。于是沈德潜起而纠偏，在《重订〈唐诗别裁集〉序》中开宗明义宣称：

新城王阮亭尚书选《唐贤三昧集》，取司空表圣“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严沧浪“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盖味在盐酸外也。而于杜少陵所云“鲸鱼碧海”，韩昌黎所云“巨刃摩天”者，或未之及。余因取杜、韩语意定《唐诗别裁》，而新城所取亦兼及焉。

渔洋与归愚，一崇王、孟，一主李、杜、韩；这里面包涵着深刻的内容，涉及一系列的问题。由于李、杜、韩是代表唐诗中新变的作家，特别是杜甫，后来的各种流派，都可从中找到渊源，因此对不同于盛唐诗风的各家，归愚都能兼收并蓄，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归愚早年受学于叶燮，叶氏通变的文学史观对他不无影响，相对来说，比渔洋的门径要宽广得多。孙编《三百首》从表面上看有与归愚相符处，如选诗数量也以杜甫为第一位，但实际上则大异其趣，最容易看出的一点是选王维诗（二十九首）多于李白（二十七首）；而在杜诗的具体选目上，更处处可看出他以渔洋的观点反过来修正归愚观点的倾向。现分体析之：

五言古诗是唐以前主要的诗体，汉、魏、两晋名家辈出，风格各殊，都以自然浑成为极则。刘宋元嘉时，颜、谢、鲍崛起，辞尚藻绘刻炼，体尚发越跌宕，已埋下五古丕变的胚芽。但齐、梁后诗人只从颜、谢修炼藻饰一面发展，风格日渐卑靡。唐初诗人反对齐、梁诗风，提倡汉、魏风骨，往往连颜、谢、鲍也一起反对，故唐代五言古诗在杜甫之前仍以简古浑朴为尚。杜甫转益多师，继承发扬了陈子昂五古中趋向排荡的因素，以海涵地负之力，创造了唐代五古发扬踔厉，纵横驰骋的新格局，从而下开韩、白，启迪宋贤。

关于唐代五古演变的历史，王渔洋和沈归愚都有深刻认识，然而在对待这一演变的态度上，二人却有重大分歧。渔洋承李于鳞“唐无古诗，而有其古诗”之论，在《古诗选》中选唐人五言古诗，以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为正宗，以为观此五家，“四唐古诗之变，可以略睹焉”。后五年又选《唐贤三昧集》，则以王、孟为上、中卷首，趣味更趋狭隘，五古所取绝大多数为清微远淡一路。对于杜甫，二选均排斥于“正格”、“三昧”之外。沈德潜有感于渔洋之偏，《别裁》序云：“有唐一代诗，凡流传至今者，自大家名家外，即旁蹊曲径，亦各有精神面目流行其间，不得谓正变盛衰不同，而变者衰者可尽废也。”因此所选五古以李、杜为宗，杜诗入选者五十三首，居第一位，对于杜甫以下韩愈、孟郊等继起者亦各选十二首，多于孟浩然。其凡例有云：

苏、李十九首以后，五言所贵，大率优柔善入，婉而多风，少陵才力标举，篇幅恢张，纵横挥霍，诗品又一变矣。要其为国爱君，感时伤乱，忧黎元，希稷、禹，生平种种抱负，无不流露于楮墨中，诗之变，情之正者也。新宁高

氏列为大家，具有特识。

与渔洋所论相比，识见气度均迥出其上。

孙编《三百首》选有杜甫五古，从现象看，似不同于渔洋，而与《别裁》有相似处，但倘若将其具体选目研究一下，就会发现实质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三百首》所收杜甫《望岳》、《佳人》、《赠卫八处士》、《梦李白》等五诗，大都是保持汉魏传统风格的作品，而对《别裁》所录带有新变意味的如《彭衙行》、《玉华宫》、《义鹘行》，以及感讽激切的《三吏》、《三别》等都弃置不录。又陈子昂《感遇》、李白《古风》，为唐人五古名作，《古诗选》及《别裁》均大量选入，《三百首》却一篇不选。其所选李白《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月下独酌》、《春思》、《子夜吴歌》等篇，均属清逸一路，与归愚主要着眼点之所在是不相同的。从《三百首》前不取陈子昂，后不取韩愈、白居易，中间重王、韦过于李、杜，可以看出孙洙在对五古这一诗体的认识上，执正而不知变，完全站在渔洋一边，甚至比渔洋更为保守，更为偏窄。

七古是到唐代才发展起来的诗体，故诗家论七古，都以唐为正格。初唐四杰虽丽辞藻绘，尚有齐、梁余习，而格局宏大，已开唐人七古先声。中经宋之问、李峤诸家，至盛唐高（适）、岑（参）、王（维）、李（颀），“驰骋有余，安详合度，为一体”（《别裁》凡例）。李、杜崛起，雄远恢宏，开闢排荡，前无古人。元和时韩愈兼崇李、杜，合李之奇妙恣纵与杜之沉雄激壮为一处，“踔厉风发，又别为一体”（同上）。对于唐人七古发展的主流，渔洋与归愚的认识是相同的，故选录唐人七古都以李、杜、韩为中心。他们的分歧，则在对韩愈同时与以后诸家的看法。渔洋《古诗选》，韩愈以后仅附录李商隐《韩碑》一篇，此外张（籍）、

王（建）、元（稹）、白（居易）、李（贺）诸人一概不取，这种选法的实质，参以渔洋论诗就更清楚了。

对于张、王、元、白，渔洋虽不全盘否定，然而评价是不甚高的。其《分甘余话》云：“许彦周谓张籍、王建乐府宫词杰出，所不能追踪李杜者是气不胜尔，余以为非也，正坐格不高耳。”于元、白尤多贬词，以为二人诗“初学尤不可观”（《香祖笔记》）。至于李贺，在他的眼目中，“纯乎鬼魅世界矣”（张笃庆语，见《师友诗传录》）。

沈德潜在七古方面对于渔洋思想最大的突破是能深究正变源流，对中晚唐诸名家博取众长，认为“白傅讽喻，有补世道人心，本传所云‘箴时之病，补政之缺’也；张王乐府，委析深婉，曲尽人情，李青莲后之变体也；长吉呕心，荒陲古奥，怨怼悲愁，杜牧许为《楚骚》之苗裔也。”（重订《别裁》序）故《别裁》录白居易七古十三首，仅次于李、杜、韩，而与岑参同列第四位，取张籍八首，王建七首，李贺六首，仅略少于王维（九首）、李颀（九首）。

《三百首》于七古一体，韩愈而外，选柳宗元《渔翁》、白居易《长恨歌》与《琵琶行》、李商隐《韩碑》，其余一概不取。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不选白氏《新乐府》，而选《长恨歌》、《琵琶行》，这是因为“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亦唱《琵琶篇》”，这两首诗实在流传太广泛了；而《三百首》是普及读物，毕竟不同于《古诗选》、《三昧集》这类专门选本，面对上述情况，使孙洙没有回旋的余地，只得把它选入。二是《韩碑》牵涉史事繁多，句奇语重，音调沉闷，且有七平七仄的句子，对于初学者来说，既不易领会，又不便讽诵，为什么孙洙一反可接受性的原则，把它选了进来呢？很显然，这完全是步渔洋《古诗选》后尘的。

唐人五律，由齐、梁新体发展而来。初、盛之际，沈、宋之典丽精工，王、孟之清微淡远，为世所宗。杜甫别开生面，寓纵横颠倒是整密之中，错综变化，不可端倪。其格调不主故常，宏大、阔远、富丽、幽微，各体皆备。《别裁》选杜甫五律八十一首（合五言排律计算，下同），王维四十一首，为杜甫的二分之一，孟浩然二十一首，为四分之一。孙编《三百首》选杜诗十首，而王、孟亦各九首，不仅在选目的比重上明显看出一主杜陵，一主王、孟的歧异；而且所选杜诗，绝大多数偏于气势稳顺，蕴藉自然，与归愚径路之广，也是有所不同的。王、孟以下，《三百首》所选以刘长卿及大历十才子为重点。这些诗都是摩诘的嗣响，他们在书中形成一条线索。

“中兴高咏属钱郎，拈得维摩一瓣香。不解雌黄高仲武，
长城何意贬文房？”

从渔洋这首论诗绝句，可以看出孙编《三百首》五律选目主导思想的渊源所在。不仅五律如此，于七律亦有类似情况。

和七古一样，七律是唐代新兴的诗体。初、盛之际，以高华典丽为贵，内容则以应制唱酬为主。王维、李颀，兴象超妙，为盛唐七律的正格。稍后杜甫崛起，“雄浑浩荡，超忽纵横”，极尽变态，大大扩展了七律的题材和意境。大历、贞元间，诗坛崇尚王维。到了元和时，杜律方受到重视。元和诗人中如刘禹锡、柳宗元、白居易以及稍后的杜牧、许浑都以七律名家，他们的性情体貌各有不同，但就传统继承关系来说，则是发展了杜律的一脉，都可看作杜陵之支流，宋诗之先导。此乃七言律诗由唐转宋的关键。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王、沈二人持有不同的看法。渔洋云：

唐人七律以李东川、王右丞为正宗，杜工部为大家，

刘文房为接武，高廷礼之论确不可易。（《师友诗传录》）又云：

七律宜读王右丞、李东川，尤宜熟读刘文房诸作。宋人则陆务观。若欧、苏、黄三家，只当读其古诗、歌行、绝句、至于七律，不可学。学诸家七律，久而有所得，然后取杜诗读之，譬如百川学海而至于海也。（《然灯记闻》）

虽王、杜兼崇，但盛唐以后，唯取刘长卿等大历诗人一派。沈归愚则不然，其论唐代七律，以为王维虽“风格最高，复饶远韵”，然视杜甫“才之大，气之盛，调之变，恐瞠乎其后”。对于杜甫以后诗人，则认为“刘梦得骨干气魄，又似高于随州（刘长卿）”，“柳子厚哀怨有节，律中骚体，与梦得故是敌手”，评价在刘长卿之上。故《别裁》选刘禹锡七律十三首，白居易十八首，多于刘长卿。晚唐七律除选取杜牧七首、许浑九首、温庭筠十首、李商隐二十首外，收入三十三家，见出其门庭之广大。

孙编《三百首》于王维、杜甫以下，入选者共十四家，而刘长卿及其他大历诗人就占了六家，将近二分之一。刘禹锡、白居易则各取一首而已。晚唐温、李而外，取薛逢、秦韬玉各一首，于杜牧、许浑一首不录。其于七律一体，鄙薄元和，不取宋调，倾向于渔洋的观点，是非常明显的。

七律一体中，孙编《三百首》有个很突出的地方，即关于李商隐的选目。《别裁》亦重李商隐七律，但多取其继承杜甫格调，较为悲壮一路，如《安定城楼》、《哭刘司户》、《重有感》、《隋师东》等，而对无题诗一首不录，《三百首》选李商隐七律十首，其中无题六首，《锦瑟》、《春雨》二诗，论其性质，也应属无题一类，合计凡八首，着眼点与《别裁》是大不相同的，我们认为这是受到当时另一唐诗流派晚唐诗派的影响。晚唐诗派与王、沈

虽有宗盛、宗晚之分，而反对宋调诗，则较之王、沈更为剧烈。他们推崇温、李，以为其诗深于比兴，曲折深微，而无题诗都是有政治寄托的（参冯浩《玉谿生诗注》），所谓“寄遥情于婉变，传深怨于蹇修”（朱鹤龄《李义山集笺注》序）。孙洙似正从这一角度而看重李商隐的无题。这就与渔洋观点表现出一种微妙的联系。渔洋认为：“宋初学西昆^①，去唐却近，欧、苏、豫章，始变西昆，去唐却远。”（《师友诗传录》）认为西昆在宋调诗之上，与晚唐诗派有一致之处。

在绝句方面，孙编《三百首》所选，同于渔洋《万首绝句选》者较多于《别裁》（见前统计数字）。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三百首》于七绝一体，选入晚唐诗篇特多，和其他各体颇不一致。这是因为重视晚唐七绝，是明七子以来至王、沈诸人的一致观点。王世贞《艺苑卮言》于其他各体极推盛唐，于七绝则云：

七言绝句，盛唐主气，气完而意不甚工，中晚唐主意，意工而气不甚完。然各有至者，未可以时代优劣也。

渔洋《万首绝句选》凡例引王世贞语，认为“此论甚确”。并云：

“中唐之李益、刘禹锡，晚唐之杜牧、李商隐四家亦不减盛唐作者。”沈德潜《唐诗别裁序》亦以李益、刘禹锡、杜牧、李商隐、郑谷五家绝句为盛唐嗣响。孙洙正是按上述思想安排选目的；而在王、沈二家之间或有异同之处，他所拳拳服膺者，则在渔洋方面。

^①西昆，诗派名，始于宋初杨大年、钱惟演等人的《西昆酬唱集》，在这之前，并无西昆名目。由于西昆学李商隐，后人往往把西昆和李商隐混为一谈，甚至错误地把李商隐说成西昆。如惠洪《冷斋夜话》谓：“诗到义山，渭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涩，时称西昆体。”元好问《论诗绝句》云：“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这里的“宋初学西昆”，是说西昆学李商隐，也是把李商隐诗说成西昆。“唐”，指盛唐。

沈德潜《说诗醉语》有云：

诗有当时盛称而品不高者，王维之“白眼看他世上人”，张谓之“世人结交须黄金”，曹松之“一将功成万骨枯”，章碣之“刘项原来不读书”，此粗派也；朱庆馀之“鹦鹉前头不敢言”，此纤小派也；张祜之“淡扫娥眉朝至尊”，李商隐之“薛王沉醉寿王醒”，此轻薄派也。又有过作苦语而失者，元稹之“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情非不挚，成蹙蹙声矣。李白“杨花落尽子规啼”，正不须如此说。

这里所举，除王、张二例外，均为中晚唐的七绝名作，也都是唐人七绝的变调。所谓粗派，亦即后来的宋调七绝；所谓纤小派、轻薄派正是明清人所说的晚唐体七绝。可见沈德潜虽不一概反对晚唐七绝，却极力反对中晚唐人有乖盛唐“语近情远，含吐不露”的七绝诗风。孙编《三百首》于归愚所举各诗中，仅录入朱庆馀“鹦鹉前头不敢言”一首，而这一首却见于《万首绝句选》。应当指出：渔洋在七绝方面的观点较之归愚反而较为开通，对于晚唐体七绝并不反对，归愚所举纤小、轻薄三例，均见于《万首绝句选》中，但归愚所举粗派诗，渔洋亦一概不取（参《万首绝句选》凡例）。由此可以看出孙洙受影响于渔洋者更甚于归愚，无论渔洋较归愚保守或开通处，孙编《三百首》多从渔洋。对于晚唐诗派，《别裁》不选，而渔洋不尽废，孙编《三百首》亦略有所取；对于宋调诗，渔洋晚年颇加厌薄，孙洙也步趋唯谨，摒弃不录。

合计以上各体孙洙所选三百一十一首诗中，盛唐一百六十一首，大历五十一首，共二百一十二首，约占百分之七十，而对唐诗第二个高潮元和时期，收诗三十三首，仅占百分之十，这显然因为“诗到元和体变新”，元和是唐音变调，宋诗先驱的

缘故。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孙编《三百首》是一部以盛唐为正宗，大历为接武，提倡和平清远的诗风，严格区分唐、宋诗的界线的普及选本。书中确实选了不少“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的雅俗共赏的好诗。然而，它的艺术趣味比较单调，所展现的艺术天地不够宽广，远远不能反映唐代诗歌丰富多彩的全貌，更不能从中窥见唐诗的承传因革关系和发展线索。对于唐诗这份珍贵的文学遗产，如何撷取精英，以少总多，今天读者有着更高的历史主义的要求，是不可能从孙编《唐诗三百首》里得到满足的。

(三)

我们这本《唐诗三百首新编》吸取了孙编《三百首》的经验教训，力图破除过去各种派别门户之见和一切理论教条的束缚，从唐诗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在可接受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发挥微型断代选本的作用，选取各个时期各种不同风格流派优秀诗篇，使之成为既是具有较高美学价值、欣赏价值，为初学所喜闻乐诵的唐诗读本，同时对于有志研究的读者，它又可作为窥测唐诗发展概况的角度得当的窗口和引向堂奥深处的起步台阶。

在作品编排方面，采取按人和分体相结合的方法，首先按作者时代先后依次排列，以卒年为准，卒年未可确定者，按登第年；二者均无可考，则据有关记载插入相应地位。其次，对同一作家的作品，按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分体编排，排律附律诗内，乐府不另析出。由于入选的诗篇，对